

情满夜光杯

袁鹰

新民晚报《夜光杯》创刊七十载，编者来电约稿。夜光杯！霎时间千条思绪，百种情怀注满心头，竟不知从何说起。略一思量，我和《夜光杯》的情缘竟然也有七十载了。

抗日战争胜利第二年的1946年，我在上海一面读大学，一面跨入新闻界，供职于姚苏凤、冯亦代先生主持的世界晨报。它同新民晚报都在外滩附近的圆明园路上，我也就同《夜光杯》编者、诗人袁水拍时相过从。袁水拍当时在外滩中国银行任职，下班后就到近在咫尺的新民晚报编副刊。前辈嘱我写稿，不敢违命，就勉力写些小文补白。记得最初写的是介绍刚出版的胡愈之先生从南洋回国后所作《郁达夫的流亡和失踪》一书。三十年代的名作家郁达夫抗日战争时期在新加坡编报，向华侨宣传抗日，影响很大。太平洋战起，日军侵占新加坡，他同胡愈之、王任叔等华人志士撤退到苏门答腊巴雅公镇，隐姓埋名，开了一家酒厂。当地被日军占领后，由于他精通马来语和日语，出面同日本人折冲，保护了许多当地人士，但也被日本占领军侦悉了真实身份。1945年8月日本战败后，终被占领军杀害。此书是胡愈之向国内文艺界的一份如实报告，我向《夜光杯》推荐，也是希望更多的读者了解那位老作家的悲惨命运，了解日本侵略者的凶残本性。

从此，也就建立了一个业余作者同报纸副刊编者的友谊和联系。虽然写稿并不多，却一直不绝如缕。解放前一两年，应赵超构先生之命，用“特约文化记者”名义，负责采访一些文化新闻，因而在解放后多年同赵老相晤时，他还热情招呼，说“你是新民晚报老人”，使我顿时有受宠若惊之感。

近三四十年来，尽管写稿不多，但我同《夜光杯》的情谊一直延续到现在。有两次投寄怀念旧日师长的稿件，字数较长，竟然都被连续两天刊登，这种例外的特殊照顾，使我分外感激。我本人当过多年副刊编辑，深知版面上必须丰富多彩，短小精干。像《夜光杯》这样八开报纸的副刊，每期刊长短稿件总在六篇以上，是很不容易的，可见编者的缜密用心。

悠悠七十载，情满夜光杯。纸短情长，一言难尽！



过程

黄惠子

丑小鸭要是不曾那么难过伤心，变不成白天鹅就成了件无所谓的事情。不变，老样子就是；变了，亦不会有太大喜悦。这个世界，快乐是需要痛苦衬托的，你若麻木，再美的景色也不会觉得感动。喜、悲、伤，总在各自时间段以各自姿态呈现于各人，不慌不忙地铺展，打破生活原本平衡又让人从中不断开始寻找新的平衡。活着大概就是这样的一种过程。

这过程是安静的，并不似想象中波涛汹涌。而力量包含其间，一次一次，叫人一如既往。



红杏与家雀 (油画) 刘世江

新民报北平版1946年创刊，我家订了一份，那年4月29日我在“北海”副刊刊出我的习作《鸟语》，我一发而不可收，到岁尾年头，发了四十来篇小品。除了文艺性的综合副刊，我还爱读社会新闻，以及由总编辑方奈何每天在“鼓楼”副刊上开的每日专栏。大约秋冬之际，我写了一封信去，说在创刊之初，专栏作过一些惊心醒目之论，相当的“硬”，“现在为什么软化了？”希望今后不要让读者“徒唤奈何”。

没想到“鼓楼”版把我的来函照登，署名奈何的专栏以《鼓吹软化》为题作出回应。这位总编辑心平气和地从写报章文字的甘苦说起：“兴之所至，写篇文章，是很快乐的，如果把这件事情作为工作，已难感到兴趣，再限定某一范围，更要感到痛苦了。十余年前在新北平报按日撰短文，栏题为‘扯淡’，随便谈，后来在晨报编副刊，偶然作篇小品，也不过是随笔杂感之类，现在回忆起来，那时生活太愉快了。”接着他说了为文之难，“我最怕写社论与短评，板起面孔说话，而在我国的政治环境下，轻了不是，重了也不是，我不愿说废话，同时又不愿平白得罪人。所以抗战八年，我几乎八年

吃也要学习

任溶溶

过去霞飞路(今淮海路)上有不少俄罗斯菜馆，上海人称之为罗宋菜馆。进罗宋菜馆自然要吃罗宋汤。罗宋汤里有一大块牛肉，我一直很简单，一面喝汤，一面就把牛肉啃掉了。可有一次和彭述之老师一起吃罗宋菜，我才真正认识到吃罗宋汤那块牛肉也很有讲究。彭老师是到过苏联的，当然知道吃法。我看着他先把汤喝了，剩下那一小块牛肉。他在牛肉上浇上辣酱油，好像吃牛扒一样用刀切开来吃。不是好像吃牛扒，就是吃牛扒。我真是大开眼界。又比方我曾到菲律宾访问。有一次主人宴请我们，请我们吃菲律宾菜。菲律宾人吃炒饭是用手抓的。我用手抓起炒饭，却没法把饭吃到嘴里，它们都在我的手里漏掉了。我看一位菲律宾贵夫人用手抓炒饭吃，手势十分优雅，抓一小把就把饭送进嘴里。我实在办不到，只好不吃炒饭，吃鸡腿，吃牛扒。如果我长期呆在菲律宾，就必须学会用手抓饭吃了。说起来，吃也是要学习的。

没动笔，渐渐养成了怕写文章的习惯。”抗战胜利，他来办北平版，“照例编者要写点东西，我原想恢复我的‘扯淡’，但朋友们以为这名词不登大雅，遂又决定用‘鼓吹’二字以为栏首，其实狗嘴吐不出象牙，

忆旧悠悠七十年

邵燕祥

鼓吹云云，亦扯淡而已。燕祥君以为本报创刊之初，鼓吹来得相当硬，这是过誉，新民报在后方曾被某种人批评为尖锐刻辣，我是安分守己的人，深知明哲保身之道，岂敢胡言乱语？至于觉得今日鼓吹软化，我却乐于接受的。”笔头一转，他说：“报纸是属于读者的，读者的言论，才是真正的舆论，鼓楼版是预备给读者发言的地方，编者的话，只是抛砖引玉罢了。”

这位总编辑不愧是文章老手，你看他一支笔跌宕生姿，既曲曲传出了办报人的艰难处境，又把球踢回给读者了。

其实，怪我当时年幼无知，不懂事，这是什么时候？停战协定已经撕毁，内战方殷，当局正加紧控制舆论，你倒好像要怂恿编者学许褚赤膊上阵似的。

一位我后来的诗友，当时重庆大学的中共秘密党员康华楚，是重庆晚报副刊的作者，他写了不少直面现实，“为事而作”的打油诗。他读工科，却不逊风骚，庄谐并举，犀利泼辣，笔下有新乐府之风。他虽长我九岁，其实1947年时也只才二十三岁，干了一件事，将编者的军，跟我写那封信如出一辙。

重庆新民晚报副刊那时一度有关于“鬼”、“谈红”、“扇子”等专栏见报，可爱的华楚兄寄诗来讽刺说：“俗海浮沉未认真，得时休喜失休惊。逢人且说三分话，写稿宜留半点心。几处红楼开夜宴，一时‘纨扇’障风尘。‘夜谈’此夜虚前席，不话苍生话‘鬼神’。”至今还能感到诗中

那股少年锐气。那位编者虚怀若谷，不但原诗照发，连同华楚写在诗前面的“打油诗嘲之，非贺也。敬乞编者先生剪下留情，万勿塞之废纸堆中，反见小气也”，也一起刊出。那位编者可能是张白山先生，是长者，能理解年轻人血气方刚必然带来的性急和莽撞之病吧。

我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才跟上海新民晚报《夜光杯》结上文字缘的。到20、21世纪之交，华楚兄将近八旬，每年新春佳节，都要写一组诗给友人贺岁，人诗俱老，沉郁醇厚，每收到他的新作，我就转给《夜光杯》及时发表。这样，我们这两个七十年前分别跟北平和重庆两地新民晚报副刊编者心路相通的少不更事的小作者，在垂暮之年，又与上海新民晚报《夜光杯》的编者“打成一片”了。

十多年前，新民晚报《夜光杯》开辟了“科学随笔”专栏，我因把自己发起的民间环保组织绿家园志愿者的宗旨定为走进自然，认识自然，和自然交朋友，以至于也就在感悟自然的同时，记录着自然。我的记录随笔，很多刊发在这个专栏里。

刚刚从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回来。那里因今年的大旱，为牛羊准备冬天的食粮已无望。牧民们改了行做旅游。草原上的房车，一晚上1580元。新盖的蒙古包有沐浴房，大窗户看外面的风光。拿着年薪的牧民腰包是鼓了，可草原上荒漠化在一天天加剧。

2014年我们绿家园发起了“黄河十年行”活动走在瘦了的黄河边，干了的大草原时，草原生态学家刘书润对记者们说：蒙古人不愿种地，不愿盖房子。游牧民族的意志是非常顽固的。蒙古人有一句谚语。孩子问妈妈：“为什么我们总是搬来搬去，辛辛苦苦？”妈妈说：“我们要是一固定在一地，大地母亲就会疼痛，我们不停搬迁就像血液在流动，大地母亲就感到舒服。”刘书润说：有趣的是，牲畜好像知道资源消耗与再生的临界点，牛羊不过这个线值，一到高峰期就走了。草与牲畜在合适的线值，牲畜自动离开这片草原。就是这么神奇！

草原上的牧民六天搬一次。为什么是六天？寄生虫的繁殖期是一周，蒙古

沪上报纸的文学副刊，《夜光杯》是篇幅最小的一种。小虽小，却能小巧玲珑，小中见大，一直办得生气勃勃，丰富多彩，这是很不容易的。

我真正接触《夜光杯》是在改革开放之后，尤其是在我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之后。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夜光杯》与文汇报《笔会》一起，扮演了我研究现代文学史启发者和引导者的角色，一直使我受益匪浅。陆蠡存、黄裳、沈毓刚、李君维……还有现在还健在的秦绿枝先生，许许多多我识与不识的文坛前辈都是《夜光杯》的重要作者，他们的往事回忆、文学札记和文史随笔，虽然大都只有千字上下，却为我打开了一个个我以前所不知道或有所忽视的文学史领域，提示我发现新问题，进行新探索。我的张爱玲研究从《夜光杯》获益良多，就是一个明证。

后来，我去查阅1950—60年代的《夜光杯》，又发现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研究先行者瞿光熙的许许多多研究心得也刊登于《夜光杯》，不能不使我感到新的意外的惊喜。再后来呢，我自己也步文坛前辈的后尘，加入了为《夜光杯》撰稿的行列。

近年来，由于这些令我敬重的文坛前辈的先后离去，《夜光杯》上短小精悍、文情与史料并茂的文字渐渐少了。但我至今订阅新民晚报，就是因为《夜光杯》仍在继续，仍在发光。在《夜光杯》七十大寿之际，我写下这些文字，一方面表示我对《夜光杯》的感激，另一方面也献上我衷心的祝愿，祝《夜光杯》再创辉煌。

人是靠游走来躲灾。

有人说，游牧再也不会回来。刘书润认为还会回来，因为这是最省钱，最省力的方式。刘书润说，放牧文化在世界上是巨大的文化，正好与农耕文化有许多相辅相成的方面，相互吸收，相互促进。

今天，呼伦贝尔大草原上的游牧生活却正在一点点退出和表演化。

我一直对萨满教充满好奇。萨满曾被认为有控制天气、预言、解梦、占星以及旅行到天堂或者地狱的能力。萨满教相信人有三个灵魂：①生命之魂②思想之魂③转生之魂。萨满教崇拜自然：①拜火。认为火来源于天界，最神圣、洁净，也最亲切，能洗涤一切污秽。②拜山。认为山曾是民族部落祖先的居所或起源地，并主宰各类禽畜。③拜日月星辰、风雨雷电。鄂温克人说太阳出来的地方有位白发老太婆，乳房硕大无比，所有小孩都是她赐予的。④拜动物。每当猎到熊后，均要举行仪式，割下熊头，放在树架上，大家跪下对它敬烟叩头祝祷：爷爷！⑤拜祖神。举行宗教仪式时，要恭请祖神降临附体；同鬼神交战时，须凭借祖神的力量。这是近存各族萨满教的共同特征。

游牧，拜自然，领悟之后发现，这不正是生态文明吗？科学随笔正在记录人与自然。

疾书科学随笔

汪永晨

今天，期刊已是国内应用数学和力学界最具国际影响力的期刊之一。作为一本专业性品牌期刊，AMM被国内外20多个知名数据库收录，并被美国力学科学院评为17种国际力学刊物之一。特别是自获得“中国科技期刊国际影响力提升计划”资助以来，AMM在国际学术界的能见度活跃度直线上升，目前是国内力学类和数学类SCI影响因子最高的期刊，获得过“国家期刊奖百种重点期刊”“中国高校精品科技期刊奖(教育部,连续五届)”等多项荣誉。

钱先生是一面旗帜，开创的是一份伟业。他坚持“国家的需要就是我的专业”的思想，将本刊的方向定位在应用数学和力学上，支持以国民经济建设为导向的学术研究；他放眼世界，高瞻远瞩，力主创办“外向型”刊物，将AMM打造成一个将国际国内成果“请进来，走出去”的顶尖平台；他不拘一格，敢于善于扶持年轻人，把他们放在重要的岗位上，放手让他们在辽阔的土地上驰骋，使国家的应用数学和力学事业后继有人。

《社会》杂志是在中国社会学家秦泰费孝通的亲自关心下创办的。

钱伟长先生对《Applied Mathematics and Mechanics (English Edition)》(《应用数学和力学(英文版)》,以下简称AMM)钟爱有加,常将期刊与上海大学、上海市应用数学和力学研究所相提并论,把它们看作是伴随他人生最后旅程始终不离不弃的三个最爱的孩子。

在艰难中诞生。为了国家的科技发展,为了促进应用数学与力学的交融,为了给国内外学术界提供一个交流互动的渠道,也为了培养更多的应用数学和力学人才,创办刊物一直是钱先生的夙愿。直到1978年,国家的科技政策发生了变化,是年已66岁的钱先生立意创办刊物,经过无数次尝试,硬是为刊物问世“杀出了一条血路”,一年之后终于拿到了刊物的“准生证”。

1978年,在钱先生的号召下,很快就聚集起一支二三百人的队伍,组成了以专业组成员为核心的小组,开始筹备创刊。钱先生提出初步方案,英文刊物确定,属于力学基础研究类刊物;实行编委推荐制;编委会成员应是活跃在科研第一线的中青年学者,只看能力,不看资历。三十九位编委中,只有两位院士和少数几位知名教授,其余多为一线

工作的副教授、讲师等。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下,钱先生以巨人的气魄,号召全国有为的应用数学和力学人才聚集一堂,共襄盛举,开创了一份伟大的事业。

钱先生事无巨细,亲力亲为。自创刊开始亲任主编,事必躬亲,严把刊物质量关,2002年改任名誉主编后,依然关注和指导编委会的工作,曾先后为刊物撰写并发表论文40篇左右,审查推荐论文近500篇,每一期

钱伟长与《应用数学和力学》

徐海丽

的稿件都要自己亲自审阅,直到90高龄。在他的率先垂范下,办刊没几年,AMM得到蓬勃发展并取得了引人注目的业绩:很快由季刊转为双月刊,继而转为月刊,当时在国内并不多见;办刊伊始就注重期刊的国际化,一直由海外机构进行国际推广和发行;成为我国最早的同时为SCI和EI收录的期刊之一;形成了强有力的编委会和稳定的作者群,最初的编委会成员中成就了16位国内外院士、15位校长、副校长乃至副省长,大部分成员成为学界和相关领域的中坚力量。

十日谈

名人与名刊